

西方文论思潮

XIFANG WENLUN SICHAO



张玉能 著

武汉出版社



00953148

西方文论思潮

XIFANG WENLUN SICHAO

张玉能

著

武汉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书号: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思潮/张玉能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8

ISBN 7-5430-2020-3

I. 西… II. 张… III. 文艺理论-西方国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320 号

书 名:西方文论思潮

著作责任:张玉能

责任编辑:王业勤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版:武汉出版社

社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编:430014

电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刷:通山县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6.25 字数:360 千字 插页:3

版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430-2020-3/I·293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言

所谓西言文论，指的是流传于以欧洲为主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它是对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身及其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思考的结晶。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于公元前4世纪成书并得以广泛流传以后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文论）在西方一直被称为“诗学”。文学或统称为诗，以其独特的语言媒介和高度的想象性、抒情性、哲理性成为艺术王国中的佼佼者，或者说是艺术王冠上的一颗最大、最亮的明珠，那么关于文学（诗）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文论）或诗学很自然地西方也成为显学，成为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况，从古希腊（至少是公元前6世纪）直到当今后现代文化理论、美学、艺术理论，都沿袭成为一种传统，甚至有人称后现代文学理论为文学殖民主义，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诗学，福柯的新历史主义文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文论，杰姆逊的西文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论，还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论，东方后殖民主义文论等等，都成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坚，大多以文学和文学理论作为主要对象来阐发他们各派各家的哲学、政治、美学、文化的观点和思想体系。

因此，对于西方文论进行研究，多视角、全方位地探寻西方文论发展的规律，对于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西方文论思潮》就是笔者鉴于西方文论的这种重要性而于十几年进行多视角探寻西方文论发展规律的尝试性成果。我之所以不以单个的文论家为单位而要以文论思潮的变化为经线并以文论家为纬线来结构我的研究框架，这是因为西方文论的发展确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各种思潮，抓住了文论思潮的变化发展，西方文论的规律和脉络也就一目了然了，而再辅以各种思潮的主要代表文论家的剖析，就可以把宏观审视和微观阐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具体的西方文论的发展景观。

西方文论思潮的演化过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一些大的发展阶段：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文论→公元5至13世纪的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公元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论→公元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论→公元18世纪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德国古典文论和现实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实证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现代主义文论（包括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文论以及精神分析、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心

理学文论、形式主义文论、人本主义文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解构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等)。

本书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整个西方文论思潮的来龙去脉,承继影响,是非功过都作了简明扼要、客观准确的评述,并力图从中探寻出一些主要的发展规律。不过,由于篇幅、作者能力、内容编排等方面的原因,本书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文论,特别是一些泛化了的文论,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未做很多的涉及,然而对于这一时期一些直接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文论思潮,如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的文论仍然作了较细致的评述。

文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本身的诸如社会、作者、接受者、作品、文体、内容、形式等各种要素也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西方不同时期的文论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思考文学,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学理论观点、体系和思潮,而这些理论观点、理论体系和理论思潮的产生、发展和更替,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本书在评述西方文论的各种观点、体系和思潮时,力图根据客观事实,多视角地探寻它们的发展规律,其目的一是更好地理解有几千年历史的西方文化本身,二是从这些规律来形成一个参照系,以此来丰富和发展中国自己独具特色的文艺理论。作者认为,后一目的甚至是更加迫切和重要的方面。

西方文论的直接源头是古希腊文论,尤其是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的文论。由于地理环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古希腊形成了以天人相分追求知识的科学型文化和向外求真的科学型美学，因而在文学的本质、创造和接受等文论（诗学）问题上也是以真实（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真实）为最重要的方面。这样，整个古希腊在文学（包括艺术）本质论上就是以摹仿说作为基调，而且形成了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真实创造摹仿论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就形成了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19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对立思潮，这就是西方文论中由席勒奠基到高尔基大力宣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发展。浪漫主义文论的发展脉络为：柏拉图→普罗丁、朗加纳斯→奥古斯丁→但丁→卢梭、理查逊、夏夫兹博里、博克→康德、谢林、费希特、施莱格尔兄弟→华兹华斯、柯勒律兹→司汤达、雨果。现实主义文论思潮的流变大致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托马斯·阿奎那→莎士比亚、达·芬奇→布瓦罗→狄德罗、莱辛→歌德、席勒、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发展路数与中国古代文论变化流程是大异其趋的。中国的伦理型文化造就了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因而中国传统文论主张的是“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所以中国古代是以情志（意）为文学的核心，因而，从古代至近代，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儒家的功利主义和道、释的超功利主义的两大思潮的对立和互补。以前我们套用西方文论的模式，所以产生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西方文论发源于古希腊文论，因而古希腊的古典主义文论就成了西方文论的重要根基和范式。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古罗马的古典主义是对古希腊古典主义的定型化，因而

一般都把二者统称为古代（古希腊罗马，Antik）古典主义。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文论则是对古希腊古典主义文论的基督教化，中世纪早期盛行的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古典主义文论，后期盛行的是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古典主义文论。不过，中世纪文论由于受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影响，形成了神秘主义文论。这种神秘主义文论长期以来受到忽视，认为中世纪黑暗时代扼杀了文论。其实不然，中世纪文论由于神秘主义和希伯来文化精神的渗透，一方面使文论更加形而上化，更多地探讨一些玄而又玄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把文学与美、善、真等更一体化地结合起来，因而不像中国古代文论那么零散；另一方面，中世纪文论在神秘主义的外衣下研讨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文论问题，对以后的继续探讨形成了伏线，如光（鲜明）、和谐、直觉、灵感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是西方文论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正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文论和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共同交汇成了西方文论的源头。因此，西方文论受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就形成了19世纪以前西方文论的“自上而下”形而上学特点和“体系化”的完整统一结构倾向。

古希腊至19世纪的西方文论是以古典主义为主导倾向的。因此，一方面，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是古典主义的基督教化，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论是它的世俗化，新古典主义文论则是它的中央集权化，启蒙主义文论又是它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德国古典文论就是西方古典主义文论的完善化和体系化；另一方面，西方古典主义文论的主要观点也仅仅是在一个新形势下的形式变化，比如，摹仿说，到中世纪就成了

摹仿上帝说，到文艺复兴则成了镜子说，到新古典主义那里演变成摹仿古人说，在启蒙主义那里又成了逼真摹仿性格或情境说，然后在德国古典文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那里系统化为再现说。正因为如此，过去的苏联和我国文论美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文学艺术一直到19世纪以前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流派的，这样说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最后发展到只承认或只肯定现实主义，就过于绝对化了，而且，即使古典形态的现实主义占有主导地位，它也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着具体表现的，也不能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西方文论的发展，以19世纪为大的分界，19世纪以前为古典主义，19世纪中至20世纪60年代为现代主义文论，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后现代文论。古典文论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潮流，在文艺本质上主张摹仿说（镜子说、再现说），在文艺创作上主张反映自然（现实）和有节制地表现情感和想象，在文艺接受上强调净化、娱乐、教化等功能。而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带来了西方文论的巨大变化。这时，西方文论从形而上的探索转向了形而下的实证，以古典现实主义为主导潮流转变为流派纷呈、变化多端、方法多样，加上马克思主义文论给它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整个西方文论也呈现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潮涌动的局面。因此，文艺观点也五花八门、不断翻新，文学的表现论（表现感情、想象、直觉等），文学的形式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文学的符号论（卡西尔、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美学文论），文学的意志功能论（叔本华、尼采），文学的心理

功能论（本能升华论、移情说、距离说、形象孤立说等），文学的生命表现形式论等等，层出不穷；各种文学流派也纷纷影响到文论诗学，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唯美主义文论、印象主义文论、象征主义文论、超现实主义文论、自然主义文论，也都树起大旗，应运而生。就在这些流派纷呈、新见迭出、翻新斗奇的变幻莫测的文论图景的深层，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文论的演化发展也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同步，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文论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文论，格式塔心理学文论等；人本主义文论主要有：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文论、分析心理学文论、西文马克思主义文论、存在主义、移情说等心理学文论。这种状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革命风暴过后，整个欧洲、美国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文学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它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文论、后精神分析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代表，打破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论的中心化、人本化、固定化、价值（意义）的一元化等倾向，追求文论的边缘化、非人化、动态化、价值（意义）的多元化，消解了一切传统的固定模式，将文学及其意义作了无限的开放。不过，按照笔者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文论只是要求方法和视点上的更大自由度，不可能也不必要打破任何中心，只是突出了世界的相对性和多中心，对于文论研究倒不失为一种开放途径，然而这种开放总离不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必要构成因素，在开放到一定时

候，仍然会不可逆转地回归到文学本身。因此，传统的和现代主义的文论仍然是不可抛弃的宝贵文化财富。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废墟上建设起新时代的文论（西方的和中国的）仍然离不开前辈们留下来的遗产。

在构成文学的诸种主要因素中，西方文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平均对待的，而是在各个不同历史 and 不同社会条件下突出某一种或几种因素，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论形态。从总体上看，古典主义文论更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以摹仿说为根本，表现出客体主义基调，与自然（现实）逼真相符合的社会决定论和反映论特点。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重视，逐步形成了对于文学创造者（作家）的重视，因而以文学创造者为主要对象的传记式文学批评，研究文学创作和欣赏过程的文学理论也逐渐蔚为大观，在新古典主义文论、启蒙主义文论、德国古典文论及人本主义现代文论中都有着突出的地位。然而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由于语文学和语学研究的日益成为显学，文学作品的研究也随之成为文论研究的中心，这便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的文本研究、“细读批评”、神话研究，叙事研究等研究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些研究注意到了社会、作家、作品等与文学的各方面关系，却忽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应有地位，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受解释学美学和文论的启发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理论的影响，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一班年轻教授创立了接受美学的文论，要求建设一种以读者接受效果为线索的文学史，以后传播到欧美各地，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接受理论，其中尤以美国的读者反应理论

为影响最著。经过了这么漫长的研究中心的转移和演变，西方文论似乎已把文学因素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专题研究，这对我们今天的文论和诗学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文论和诗学要全方位、多视角地建构而成，不然会依然重走过去的老路，产生已经意识到了的失误。

此外，西方文论从古至今的发展，还有一条重要的规律，那就是由理性主义逐步向非理性主义方向转化。本来，古希腊文论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是全方位的，既有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理性主义），也有亚里士多德的诗是想象性、创造性摹仿论（非理性主义），既有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摹仿论（理念至上、理性至上），也有德谟克利特的灵感论（非理性），既有毕达哥拉斯的美是数的和谐和比例（理性神秘主义），也有普拉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感觉主义，非理性），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理性越来越在人性和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罗马时代的奴隶制集权理性，中世纪神性理性，新古典主义的封建制集权理性，直到启蒙主义时代近代理性主义的确立和理性主义的全盛，都直接影响着西方文论长期的理性主义基调，到德国古典主义文论以后，理性主义思潮才逐步由盛极而衰变。哲学、美学、文论在西方的第一个非理性主义流派就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即唯意志主义）。从此以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到处泛滥，在西方文论中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不断此起彼伏，不可阻挡，克罗齐、科林伍德的直觉主义和表现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直觉主义（统称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容格的分析心理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反理性主义，都在西方文

论之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提醒人们，文学现象不仅受到人的理性的控制和影响，它更包含着想象、感情、本能、直觉、灵感、感性、天才、顿悟、高峰体验、移情、梦幻甚至癫狂等非理性方面和因素，从而让人们更清醒、自觉地面对文学、解释文学，也就可以更全面地创造和理解文学。当然，当我们全面地反思了西方文论的发展进程以后，也可以防止文论研究完全向非理性主义方面的倾斜，而构建起能如实反映文学现象的全貌的文论和诗学。

也许我们还可以看看西方文论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关系。一般来说，西方哲学从研究重心来看，从古希腊直至今现在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从古代的自然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另一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而在这后一次大转向中又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向人类存在本身，可以称为“人类学转向”，另一种则是转向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可以称为“语言学转向”。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本体论问题，主要探寻宇宙（自然）的本原和存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纷纷探讨宇宙的本原和存在的根据，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四根”，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目的、创造的“四因”就是当时的自然本体论的一些主要观点，这种传统由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所继承，基督教神学哲学仍然是对上帝及其创世作本体论的证明，以上帝来说明整个自然（宇宙）的存在根据。但是，这种玄而又玄的探讨并未得出令人们满意的结果，因而一些怀疑论者就提出了疑问，自

然和人的存在根据是可疑的，人的探寻这种根据的认识能力也是可疑的。在这种怀疑论哲学家中有一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认为一切都是可疑的，然而我在怀疑（即思考）这一活动是确凿无疑的。这样就把人们的哲学研究重心由对存在的自然本体论研究转向了对人本身的认识（思）活动及认识能力的研究，认识论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人们要弄清自然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人们的认识能力的限度，换句话说，认识论问题成了解决本体论问题（自然本体论）的基础。因此，17、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叶，认识论问题成了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心，并且形成了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派的对立态势，对于认识的根源、过程、规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两派的对立和偏颇也十分明显。在调和两大派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康德奠基和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总结了近 200 年的西方认识论成果，而且建立了以人为目的的人学哲学，提出了自然不断向人类（社会）生成的哲学思考，并且在人类的精神因素中寻找着世界的本原，并且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庞大体系中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统一。此后，本体论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本体论问题，又引起了西方哲学家的关注。首先提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体系的是叔本华，他提出人的生存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的表象则是世界的诸多现象。接着而来，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都从人、人的生命、生命的绵延来探讨世界的本原，这就形成了“人类学转向”。在这种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的转向过程中，由实证主义的

发展而产生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实证主义，认为以往哲学的失误都在于语言学运用的失误，因此提出要清理哲学语言的运用以弄清哲学的真伪问题，像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及维也纳学派。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之中，语文学、语言学也突飞猛进地发展。现象学的始祖布伦塔诺、胡塞尔等人发现语言学比心理学在哲学中更加重要。这些现代语言学、分析哲学及现象学的对于语言的关注，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融会。他在研究存在和存在者的过程中，确立了人这个“此在”（Dasein）的根本地位，构建了他的根本的本体论，实即人学本体论，并且发现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并且认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边界也就是人的边界。从而初步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因而，此后的哲学解释学、符号学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后分析哲学，乃至种种科学哲学，都以语言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甚至以人学为主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像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等，也都关注起语言问题，并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西方哲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当然对西方文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文学作品就是以语言作为媒介来创造构成的。当语言作为人的存在的家园、人的生存方式时，对于语言艺术的文学，当然也就产生了巨大的革命。语言再也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载体、附加物、由内容决定的形式因素，语言成了文学的存在根据、存在方式、文学性质（文学性、文学本质）之所在。因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各种与语言、语言符号、语言学相关的西方文论流派也就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符号学文论，现象

学文论，解释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修辞学文论，叙事说文论，话语文论，对话文论。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更是从语言、话语、对话、交往等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因而语言学问题就成了后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因而也相应地出现了文学、文论占领了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成为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霸主、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坚，因而人们称之为文学殖民主义。这就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后现代成果。这样一来，西方文论就开辟出了新天地、新生面，在文学的回到自身、关于文学的自律规律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把文论研究由宏观把握向微观阐发大大地推动了一步。这似乎也告诫我们，文论的语言本体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而我们中国古代的大量诗话、曲话、词话、点评，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是具有超前水平的，值得我们从汉语文字的特征出发出现代的科学方法的整理、挖掘和阐发，以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言、话语、对话、交流、文体等方面的现代研究来回应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当然，语言和语言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能忽视了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重要方面的研究，比如文论中的创造论、接受论、社会学等方面的问题就不是单纯的语言和语言学可以囊括和包办的。

总而言之，西方文论思潮的研究给我们揭示了许多规律和特征，这些在这篇序言中不可能一一细谈和解析，我们在相关的地方都作了简要的提纲挈领的点明，读者可以多加注意，而更重要的是自己开动脑筋去进一步思索，以得出自己的独到的思索和见解。

本书的构思、写作和完成，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给研究生、本科生、进修生、硕士学位班学员等讲授西方文论的讲稿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因而在讲授内容上是有侧重选择的，目的是更适合于美学、文艺专业的学习者。

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仍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武汉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负责同志慨然应允拙著出版，是值得我永远感念的，此外，我应感谢武汉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业勤，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袁定坤，湖北省委宣传部喻立平、张春香等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黄敏，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恩师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他已于 1999 年 6 月 26 日离我而去，但是我的每一个字都渗透着对他的永恒纪念和衷心感谢。

作者于武昌桂子山

1999 年 7 月 30 日